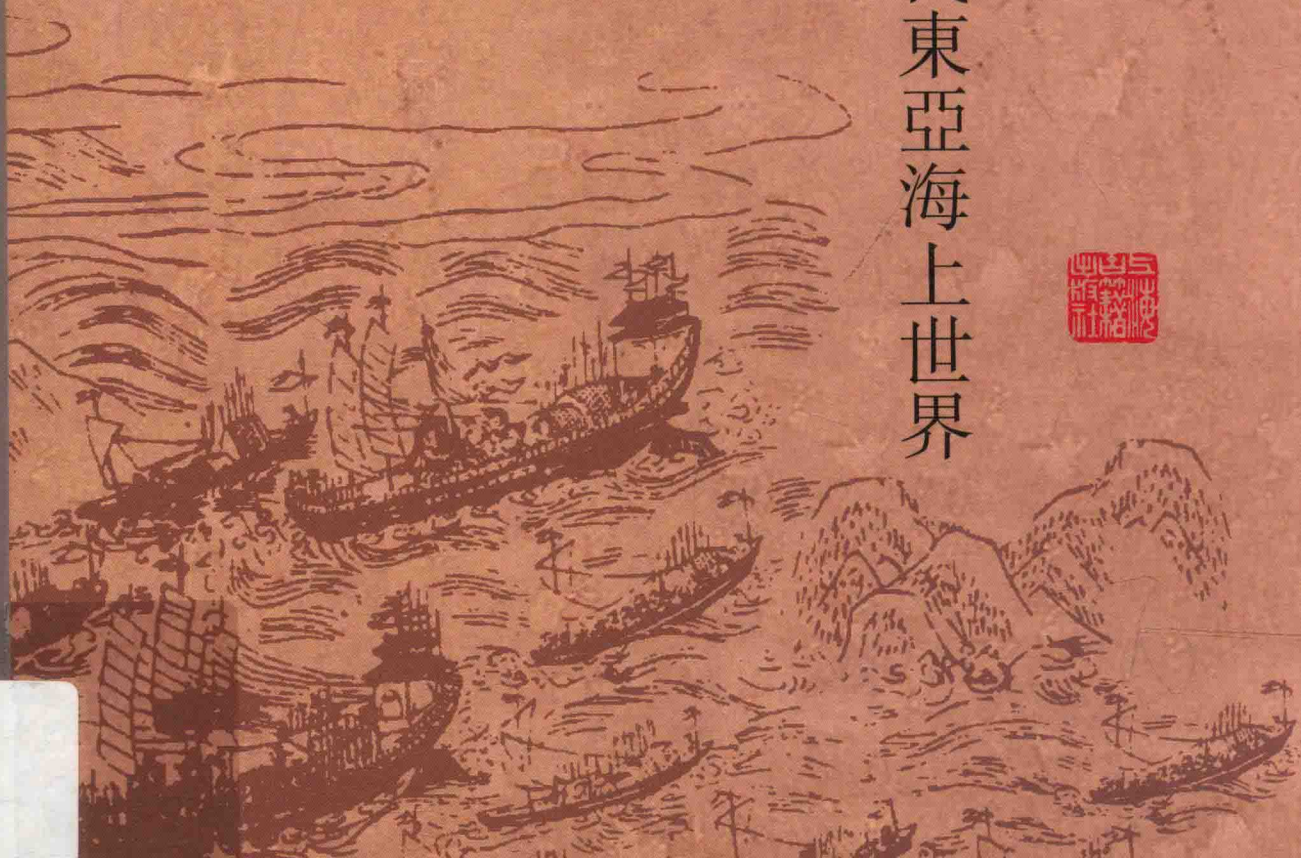


海客瀛洲

傳統中國沿海城市與近代東亞海上世界

李孝悌
陳學然

主編



海客瀛洲

傳統中國沿海城市與近代東亞海上世界

李孝悌
陳學然

主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海客瀛洲：傳統中國沿海城市與近代東亞海上世界 /
李孝悌, 陳學然主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325-8526-7

I. ①海… II. ①李… ②陳… III. ①沿海經濟—城市經濟—經濟發展—中國—近代②海洋—文化史—東亞—近代 IV. ①F299.29②P7-093.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168235 號

海客瀛洲

——傳統中國沿海城市與近代東亞海上世界

李孝悌 陳學然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o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25.25 插頁 5 字數 553,000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526-7

K·2354 定價：12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序 言

中文及歷史學系於 2014 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是香港城市大學過去追求人文及創意文藝領域卓越表現的成果；學系的成立，不但為城市大學，同時也為香港高等教育界加強人文學科乃至跨學科教研貢獻力量。為了更好地發展學系的潛能，新系建設之初即成立了一個國際顧問委員會，就學系如何面向國際化發展的學術研究提供意見，其中成員均是現時“中國學”研究的頂尖專家，分別有美國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及宋怡明教授（Michael Szonyi）、德國海德堡大學的梅嘉樂教授（Barbara Mittler）、日本東京大學的大木康教授、臺灣中研院的黃進興院士、北京大學的榮新江教授、復旦大學的葛兆光教授、香港大學的梁其姿教授與廈門大學文科特聘教授鄭振滿等等。他們為我們實施學系學術發展策略提供了專業意見，認為本系立足香港、面向中國和世界時，於未來須以“全球化下的中國沿岸城市”為重點發展的方向。

2015 年 7 月前後，即學系成立一周年之際，我們舉辦了兩場圍繞中國沿海城市及海上世界的歷史文化國際研討會，探討近代中國和東南亞、日本、韓國、歐洲等地的文化交流、移民組織、商業網絡、軍事戰略等課題。

第一場會議名為“傳統中國的沿岸城市及其近代轉型”國際研討會，於 2015 年 6 月 16 至 17 日舉行。會上邀請了來自大陸、港台及海外合共 22 名學者，提交了多篇以傳統和近代中國沿海城市為研究中心的論文，系統地探討了中國和東南亞、日本、歐洲等地的文化交流、移民、商業網絡及傳統節慶等課題，藉以深入分析沿海城市的居民五方雜處、文化複雜多元以及流動多變。在會議最後，多名學者達成一致共識：沿海城市並非靜態概念，而是不斷經歷時代、歷史變化的有機體；沿海城市需要置放在更加宏觀的空間場景中進行考察；以及相較於沿海城市的海洋屬性，其陸地屬性表現出的豐富文化傳統應得到更多重視。

第二場會議名為“16—19 世紀東亞的海上世界”國際研討會，於 2015 年 7 月 7 至 8 日舉行，這場會議乃是香港城市大學和臺北故宮合作計劃的重點項目之一，由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室策劃和撥款資助，並交由中文及歷史學系承辦、臺北故宮與香港海事博物館協辦。我們在此特別感謝郭位校長（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大學傑出教授）與林群聲副校長（香港城市大學副校長兼秘書長、生物學講座教授）光臨會議以及在籌備過程中給予的大力支持。

是次研討會共有 24 名來自美國、新加坡、中國大陸、臺灣、澳門和本港的文化、

歷史研究專家參與。會上圍繞以下主題進行深入探討：中國近世的造船技術與海軍發展；活躍在東南亞與東北亞海上及中國沿岸的海盜和商人的活動情況；明清中央與地方政府對抗海盜和制定海上航貿之措施；中國士紳與海盜和商人之間的關係；以及明清以來東亞和南洋的海上貿易、港口發展及文化風俗。

呈現在各位讀者面前的，就是從這兩次學術會議裏精挑細選出來的作品，共計有十餘篇。我們按其內容性質，將之分為以下四類主題：

- 一、社區組織與民俗風情；
- 二、近代海貿與航海輿圖；
- 三、海軍戰局與海盜管控；
- 四、亞洲海貿與僑居生活。

入選這部論文集的研究成果，其內容指歸反映了本系努力開拓的學術方向，即致力於探尋在全球化影響下的“傳統中國”沿岸城市，於商業活動、移民與文化交流等諸方面的“現代轉型”，縱深發掘近世東亞乃至東南亞海上世界的知識體系，同時反思香港作為華南中心地區及沿岸城市交匯點，在過去所扮演的角色和將來能發揮的功用。

目 錄

序言	(001)
----------	-------

一 社區組織與民俗風情

中國近代城市轉型的“草根”之路

——以福州境社傳統的演進為中心	羅桂林(003)
-----------------------	----------

從反迷信到萬緣會：廣州到東南亞的城市救贖儀式	蔡志祥(030)
------------------------------	----------

商幫、產業分佈與城市空間

——17世紀以來景德鎮徽州會館之管理與運作研究	王振忠(043)
-------------------------------	----------

二 近代海貿與航海輿圖

清代中期洋銅商楊氏研究	焦 鵬(101)
-------------------	----------

清代海外貿易通事初探	廖大珂(116)
------------------	----------

中國沿海港市與日本郵船會社的航路	松浦章(141)
------------------------	----------

《東西洋航海圖》參引史料蠡測	馮錦榮(160)
----------------------	----------

三 海軍戰局與海盜管控

粵東名盜張保仔	蕭國健(191)
---------------	----------

經驗與傳承：明代三次海盜興盛期的原因、內容與影響	盧正恆(199)
--------------------------------	----------

清季唯一的國產裝甲蚊子船“金甌”號	馬幼垣(222)
-------------------------	----------

瀕海利益之爭與明清鼎革中的粵東沿海戰局	楊培娜(262)
---------------------------	----------

清代乾隆朝以前的水師用人策略：以福建水師提督為中心的觀察
..... 李其霖(277)

四 亞洲海貿與僑居生活

Chinese Merchants and Melaka: Maritime Trade, Migration and Sojourning

Community James K. Chin (錢江)(299)

歸來壓匾翠雲鬢：琉球竹枝詞中的女性角色與社會生活 廖肇亨(315)

菲律賓呂宋票與澳門土生葡人在東亞 黃海濤(333)

“亞洲的地中海”：前近代華人東南亞貿易組織研究評述 陳博翼(350)

測量、博物與東亞海域

——徐葆光與森槐南的琉球漢詩 高嘉謙(376)

16世紀中期的馬六甲與華人海商 中島樂章(389)

中國近代城市轉型的「草根」之路

——以蘇州、杭州、南京為例——

吳建雄

一 社區組織與民俗風情

蘇州、杭州、南京這三個城市，在中國近代城市轉型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它們不僅是經濟繁榮的象徵，更是文化傳承的瑰寶。在社會變遷的洪流中，這些城市如何將傳統的民俗風情與現代的社區組織相結合，走出一條獨特的「草根」之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蘇州、杭州、南京這三個城市，在中國近代城市轉型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它們不僅是經濟繁榮的象徵，更是文化傳承的瑰寶。在社會變遷的洪流中，這些城市如何將傳統的民俗風情與現代的社區組織相結合，走出一條獨特的「草根」之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首先，我們來看看蘇州。蘇州自古以來就以「江南水鄉」著稱，其民俗風情獨特而豐富。在近代，蘇州人開始嘗試將這些傳統元素融入現代社區組織中。

其次，杭州的社區組織發展也值得關注。杭州以其優美的自然環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蘊著稱。在近代，杭州人通過建立各種社區組織，將傳統的民俗風情與現代的社區建設相結合。

最後，南京的社區組織發展也展現了獨特的魅力。南京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見證者，其社區組織的發展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在南京，人們通過建立各種社區組織，將傳統的民俗風情與現代的社區建設相結合。

總之，蘇州、杭州、南京這三個城市的社區組織發展，展現了中國近代城市轉型的「草根」之路。它們通過將傳統的民俗風情與現代的社區組織相結合，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

中國近代城市轉型的“草根”之路*

——以福州境社傳統的演進為中心

羅桂林

一、引言

近代中國的城市轉型是如何實現的？圍繞這一問題，學術界已經做了大量的研究，積累了豐富的成果。中國大陸早期關於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主要依據現代化理論，探討中國城市從“傳統”向“近代”的轉型歷程，強調從西方引入現代化資源和政府規劃引導在城市轉型中的重要作用，^①卻往往忽略了對中國本土的文化傳統與社會資源之重要意義的探討。近年來的城市史研究已有很大的改變，研究焦點逐漸呈現出“從宏觀到微觀，從精英到下層”、從“宏大敘事”向“日常取向”的轉變。^②例如，盧漢超關於“霓虹燈外”之上海的研究，^③王笛關於成都街頭文化和茶館的研究，^④董玥關於北京“天橋”社會的研究，^⑤等等，展現出中國近代城市不太為人注意的側面。具體到關於城市轉型動力的解釋，相關研究更注意從“內在”的眼光看待城市轉型，試圖追尋中國城市近代性的內生淵源。例如羅威廉(William

* 感謝李孝悌教授、王振忠教授、鄭振滿教授對本文的指教。本文係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LS1009)、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11LS16)的階段性成果。

① 代表性研究有：張仲禮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隗瀛濤主編：《近代重慶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羅澍偉主編：《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皮明麻主編：《近代武漢城市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等。

② 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從社會的最底層看歷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7—19。

③ 盧漢超著，段煉等譯：《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④ 王笛著，李德英等譯：《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衆與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王笛著譯：《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⑤ 董玥：《民國北京城：歷史與懷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T. Rowe)關於清末漢口行會組織與城市公共服務的研究,^①梁元生關於清末上海的“堂”與近代市政的研究,^②小浜正子關於近代上海民間社團與“公共性”的研究,^③都將考察的視角由國家轉向社會,由外在轉向內在,開啓了對中國城市近代發展的新認識。

本文所考察的“境社”,在福州又被稱爲“社境”,或單稱“境”、“社”,原指廣佈於城鄉地區的以社神爲主要崇祀對象的社廟。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境社組織逐漸向“分境”、“分社”或“聯境”、“聯社”兩個方向發展,由此形成一套複雜的社會制度。在福州城區,“每一街道,都有一廟,所祀的神是大王爺,爲境內的主宰神”。^④相鄰的街坊里巷之間,正是通過各自清晰的境社歸屬相區別開來的。境社不僅在福州是最主要的社區組織,在閩臺地區乃至中國其他地區都曾普遍存在,一度爲學術界所關注。^⑤然以往的相關研究主要是在鄉村社會文化史的語境中進行的,對其在城市史中的意義尚不甚明了,^⑥尤其缺乏將這一“草根”組織與中國近代城市轉型的“重大”課題相聯繫的研究。

筆者在福州從事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發現當地的街坊里巷中仍然活躍着大批此類組織,通過訪談與調研,筆者還注意到這些境社與社區居民的社會生

① 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江溶、魯西奇譯:《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魯西奇、羅杜芳譯:《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1796—1895)》(*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

② 梁元生:《慈惠與市政:清末上海的“堂”》,《史林》第2期(2000年5月),頁74—81。

③ 小浜正子著,葛濤譯:《近代上海的公共性與國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50—185。

④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福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福州地方志(簡編)》(下冊)(福州:編者,1979年),頁97。

⑤ 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華南地區,代表性的成果包括陳春聲:《社神崇拜與社區地域關係——樟林三山國王的研究》,《中山大學史學集刊》第2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90—105;鄭振滿:《神廟祭典與社區發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證》,《史林》第1期(1995年2月),頁33—47、111;王振忠:《近600年來自然災害與福州社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86—221;張小軍:《陽村的境社與宗族:一個文化場的觀點》,《民俗曲藝》(“宗教與地方社會”專輯Ⅱ)第138期(2002年12月),頁199—238;汪明怡:《臺南寺廟聯境組織變遷之研究》(臺南:臺南師範學院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黃向春:《地方社會中的族群話語與儀式傳統——以閩東下游地區的“水部尚書”信仰爲中心的分析》,《歷史人類學學刊》第3卷第1期(2005年4月),頁115—154;丁荷生(Kenneth Dean)著,劉永華譯:《福建社神之轉型》(*Transformation of the She [Altars of the Soil] in Fujian*),收入劉永華主編:《中國社會文化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34—273;等等。

⑥ 人類學界對閩臺城市的境社組織曾有過關注,參見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舊臺南的街坊祀社神》,收入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783—814;王銘銘:《明清時期的區位、行政與地域崇拜——來自閩南的個案研究》,收入楊念群主編:《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79—130。

活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聯繫。那麼，在福州——這個屬於中國最早一批的通商口岸城市（“五口”）中，在經歷了猛烈的“歐風美雨”衝擊後，此類看似最爲“傳統”的“草根”組織是如何存續下來的？其延續和發展又對近代福州的城市轉型產生了什麼影響？福州的個案能對我們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城市史提供什麼啓迪？

筆者在廣泛搜集和解读相關民間歷史文獻的基礎上逐步意識到，要想深入地理解福州近代的城市轉型，必須從當地社會的內在發展脈絡出發；而細緻地梳理福州境社傳統的近代演進，則是厘清這個口岸城市近代轉型“內在理路”的有效方式。通過本文的研究可以發現，境社作爲福州最主要的傳統社區組織，在城市居民的生產生活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近代以來，爲應對時局的頻仍變化，境社組織的政治社會潛力被極大地激發出來，衍生出多種新式的社區組織，極大地影響了福州近代城市發展的面貌。其中，“公益社”和“商事研究所”成了近代福州社區性的商民議事機關，在參與興辦慈善事業的同時，也組織和參與了清末民初的多次民衆抗議運動，是社區自治和近代城市政治發展的重要表現形式。“救火會”則孜孜於城市消防事業的舉辦，最終成爲福州消防事業的主體，爲福州近代的市政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福州境社傳統的演進歷程，清晰地展現出一條近代中國城市轉型的“草根”之路。

二、坊巷空間與境社傳統

坊巷是歷史上福州城區最主要的空間結構，也是社區居民的基本生活單位。在長期的共同生活實踐中，逐漸形成以坊巷爲基礎、以境社廟爲主要特徵的社區文化傳統。這一傳統之形成，首先與福州“府城”的築城史有關。

福州城在明清時期又稱“府城”，是由駙馬都尉王恭在五代“夾城”和宋代“外城”的舊基上重建的。該城北跨越王山，南繞烏石山和于山，有東門、西門、南門、北門、水部門、湯門和井樓門等七個城門，“廣袤方十里”，高二丈餘、厚一丈餘。城上還建有數量衆多的敵樓、警鋪、堞樓和女牆。清順治年間，總督李率泰又將城牆加高增厚，“府城”因此更加壯觀。^① 綿延的“府城”，框定了福州城市空間的基本格局，此後直到民國年間拆城築路，這一封閉空間才開始改變。

高大的城牆、密佈的哨所和按時啓閉的城門制度，嚴密地規範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也給不時造訪福州的來客留下深刻的印象。據 19 世紀中期來華的美部會（American Board Mission）傳教士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的記載：

福州包圍在城牆中，有七個高大的城門，天亮開啓，天黑關閉。從高聳的城門樓上可以觀察和控制城門的進出。城牆上相隔不遠就有一個哨所。城牆

^① 徐景熹修，曾魯煜纂：《福州府志》卷四《城池》（清乾隆十九年[1754]刊本），頁 1 上—4 上。

六至八米高，四至六米厚，用石料和夯土築成，牆體內外兩面鋪石塊或磚塊，牆頭上有花崗石的垛口。城牆全長約十一公里，牆頭上可以行走，乘轎子轉一圈可以觀察到多姿多彩的市區內外景象。^①

壯觀的城牆給人以巨大的視覺衝擊，時刻提醒着官方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存在。城牆之內的空間規劃與建築格局，也同樣彰顯出官方對城市生活的影響。福州城市的中心地帶，分佈着上自將軍、總督、學政，下至福防廳、閩縣和侯官縣在內的完整序列的地方官署，構成了城市景觀的一大特色。從清末某“保甲總局委員”繪製《福建省會城市全圖》可以看到，沿着城內南北主幹大街“宣政街”和“南大街”，分佈着布政使衙門、總督衙門、學政衙門、文廟、侯官學、侯官縣等機構，沿着城內東西走向的主幹大街“新街”，則分佈着按察使衙門、鹽道衙門、糧道衙門、萬壽宮等官方衙署或祠廟，它們是城市的主要“地標”。^②

這些官府衙署和祠廟儘管引人注目，但占據了整個城市面積主體的，卻是大大小小的街坊和里巷。這些街坊里巷萌生於福州早期的築城活動，宋以後隨着城牆範圍的相對固定而趨於穩定，“歷經宋、元、明、清，街坊雖有一些增多，但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③

與中國多數城市一樣，福州傳統的城市空間主要分為“大街”和“小巷”兩個層次，前者構成城市空間的基本骨架，後者則將城市空間進一步細分，使之趨於“細胞化”。明清時期，閩縣、侯官縣均為福州府附郭，兩縣依城中的南北中軸線——宣政街、南街——分區治理。宣政街、南街和其他十條主要大街，共同構成福州府城的基本空間格局：

城中之街十有二：^④自鼓樓前達於還珠門曰宣政街；還珠門達於南門曰南街；宣政街之右曰新街（今按察司前）；南街之右曰後街；橫鼓樓之南，西達於西門曰西門大街；折而北，達於北門曰北街（府治之西，俗名土街）；北街之左曰北門後街；還珠門之外折而東，達於東門曰東街；南達於故津門城曰仙塔街；北達於井樓門曰井樓門街；達於湯門曰湯門街；仙塔街折而西曰館前街（福星坊內）。^⑤

“街”的兩側，分佈着縱橫各異、長短大小不一的“巷”。萬曆年間，福州府城

① 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著，陳澤平譯：《中國人的社會生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

② 胡東海繪：《福建省會城市全圖》（福州鼓樓前陳文鳴刻坊清刊本，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未注比例。

③ 張天祿主編：《福州市地名志》（福州：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2004年），頁234。

④ “二”字原誤作“三”字，核校上下文，徑改。

⑤ 潘頤龍等修，林嫌等纂：《福州府志》（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刊本）卷五，頁2上—2下。

見載於方志的“巷”共有 104 條。^① 此後，隨着城市的繁榮和行政管理的深入，“巷”也逐步走向細化，至清末，閩縣、侯官兩附郭縣的“巷”共有 260 條。情況如表 1 所示。

表 1 清末福州府城的坊巷數量與分佈情況

閩 縣		侯 官	
段 別	巷 數	段 別	巷 數
中 段	6	中 段	3
東 段	37	東 段	1
南 段	23	南 段	49
旗界段	37	西 段	42
北 段	41	北 段	18
小 計	147	小 計	113

資料來源：鄭祖庚纂修：《閩縣鄉土志·地形略》（清刊本），頁 245 上—250 上；鄭祖庚纂修：《侯官鄉土志》（清刊本）卷五《地形略上之一》，頁 18 上—20 上。

福州府城的“巷”也稱“坊”、“里”，是城內最基本的空間單位，一般由一段面積適中、相對獨立的巷弄及其兩側的屋宅組成。其形制可以是直巷，也可以是曲巷，甚至是禿頭巷，一般有一端臨靠大街，內部往往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例如福州著名的“三坊七巷”，據前引清末《福建省會城市全圖》，其中的楊橋巷（登俊里）、塔巷（文興里）和文儒坊，都是典型的直巷（如圖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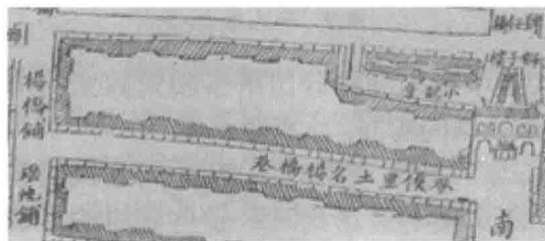


圖 1 登俊里（土名楊橋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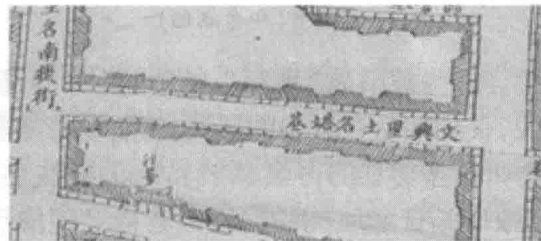


圖 2 文興里（土名塔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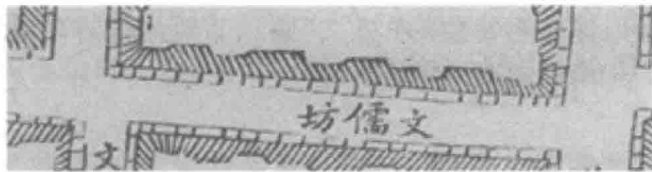


圖 3 文儒坊

郎官巷則是常見的曲巷（圖 4），文儒坊正南緊鄰的豐井鋪，也是曲巷，且為禿頭巷（圖 5）。

^① 潘頤龍等修，林嫌等纂：《福州府志》卷五，頁 2 下—4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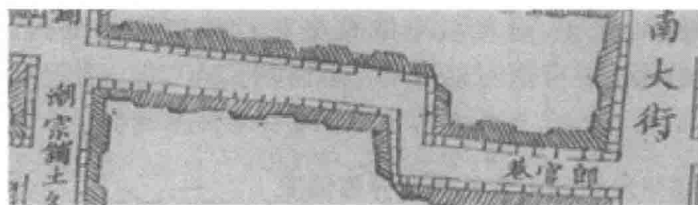


圖4 郎官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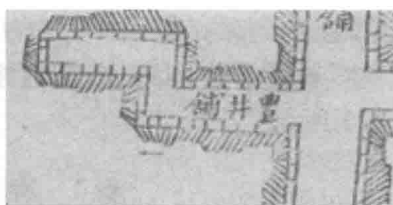


圖5 豐井鋪

黃巷(新美里)、吉庇巷(魁輔里)、水流灣(會潮鋪)和安民巷等,雖是直巷,但在一側(圖6、7、8)或在兩側帶有數量不等的禿頭弄(圖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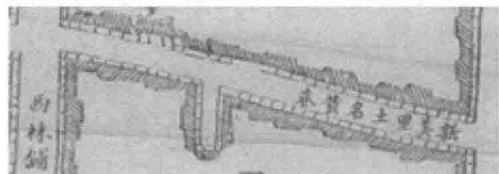


圖6 新美里(土名黃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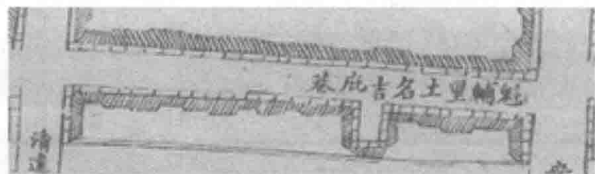


圖7 魁輔里(土名吉庇巷)



圖8 水流灣(即會潮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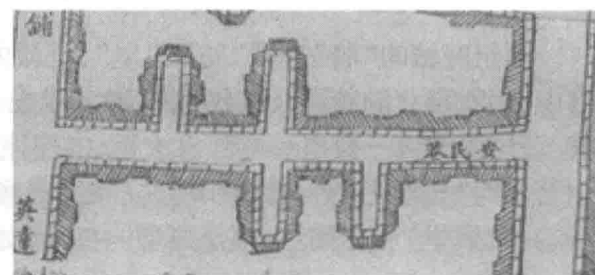


圖9 安民巷

這些被稱為“坊”、“巷”、“里”的社區,將城市空間劃分出衆多相對獨立的單位,長期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很容易形成對本社區的認同。

很多坊巷的得名源於當地的歷史名人,如三坊七巷中的郎官巷,因宋代劉濤“數世郎官宅址”而得名;黃巷得名則緣於“唐黃璞宅昔居此”。^① 這些傳說的形成和流行,為社區居民營造出共同的文化歷史,強化了坊巷居民相互間的認同與歸屬感。

有些坊巷在巷口還建有特製的“坊”、“匾”,直觀地將本坊巷的文化內涵與歷史底蘊標示出來。如南街兩邊的幾條坊巷:

(安民巷)宋劉藻宅址,藻以孝聞,賜粟帛旌之,名其坊曰“錫類”,朱文公匾。今廢。

(官賢坊巷)侯官縣街口,今匾“八閩兼邑”。

(福星坊)偽閩時為五州諸侯館,故名館前。宋湛俞隱居於此,三召不起,

^① 喻政等修,林煒等纂,張天祿點校:《建置志五·街市》,《福州府志》(福州:海風出版社,2001年)卷一二,頁143。

因名旌隱坊。元宣慰使魏天祐寓坊內，更今名。今以其地通撫臺，匾曰“東南節鎮”。^①

東街北面的三牧坊巷也是如此，其“坊”“俗名枋門，宋朱倬宅址，舊名太平坊；正德間，改今坊名，為何顯兄弟立”。^②何氏兄弟即何顯、何崗和何繼週，三人曾分別擔任知府、知州和知縣，故當時改坊名以紀盛。^③

生活於坊巷中的居民，分享着本社區的獨特文化與共同歷史，坊匾或坊門又將本社區的歷史文化直觀地標示出來，這些都有利於形成以坊巷為基本單位的社區認同。在居民形成對坊巷歸屬感的過程中，“境社”可能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而且“境社”本身也是居民坊巷認同的重要標誌。

據清人林楓的記載，福州府城大大小小的坊巷，“經緯縱橫”，居民“俗又以里、社別之，曰某境、某社”。^④也就是說，坊巷與“里”、“社”、“境”往往是互稱的。盧公明當時也注意到，福州“每一個社區都有一個屬於本社區居民的境社廟”，廟裏供奉被尊稱為“大王”的“地頭神”：

境社廟裏供奉“大王”，是專門照顧本境居民的利益的神祇。通常還都配一個“娘娘”神像，並排坐着共享供奉。境社廟裏總要安排一個位置擺放“娘奶”的神像，這個女神在已婚婦女中非常有人氣。娘奶周圍還有好幾個“婆官”——她的女性助手。大王也同樣被他的衆多部將扈從環繞着。這些主神的助手或扈從通常畫在廟內的各處牆上。境社廟裏都有一個供演戲酬神使用的戲臺。^⑤

境社廟中祀奉的“大王”，通稱“廣利侯王”，“多塑夫人像並祀”。^⑥“大王”的來源很複雜，很多是地方歷史名人。例如隆普營的惠安境，崇祀漢陳太邱的二十二世孫；三牧坊的太平公輔境，崇祀宋狀元許將；吉庇巷的耆德魁輔境，崇祀宋宰相鄭性之；光祿坊的都護廟，即倉前後巷的都護境，崇祀宋光祿大夫方真；閩山鋪的閩山境，既是里社，又是卓氏家祠，崇祀宋進士卓祐。有些境社神則從官方的祀典神轉化而來。例如東街的鳳池境，原為宋時的樞務廟，祀唐樞使張睦；西湖旁的贊福境，祀閩粵王郢，他在宋代被封為“明德贊福王”，本境也是官府在“閩城通得祀者”；北門外的梅柳境也祀漢閩粵王。^⑦各境社廟供奉的“大王”一般都不同，但都配有共

① 喻政等修，林煜等纂，張天祿點校：《建置志五·街市》，《福州府志》卷一二，頁143。

② 同上書，頁144。

③ 歐陽英修，陳衍纂：《街坊》，《閩侯縣志》（1933年刊本）卷五，頁4上。

④ 林楓纂，官桂銓等標點：《坊巷第二》，《榕城考古略》（福州：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1980年）卷中，頁31。

⑤ 盧公明：《中國人的社會生活》，頁366。

⑥ 郭柏蒼纂，張天祿點校：《祠廟》，《烏石山志》（福州：海風出版社，2001年）卷四，頁100。

⑦ 郭柏蒼纂，張天祿點校：《竹間十日話》（福州：海風出版社，2001年）卷六，頁103—104。

祀的“奶娘”，眾多的女神於是成爲境社的最大特色之一。例如北門外梅柳境、井樓門外湯邊、竹林境、麗文鋪、元帥廟河墘等處，都祀“奶娘”，香火很盛：

（北門外梅柳境）境內祀奶娘，稱北山梅柳奶。井樓門外湯邊所祀奶娘，稱南山湯邊奶。竹林境所祀奶娘，稱歐奶。城隍後殿所祀奶娘，稱金氏夫人。德政橋下所祀珠媽，稱劉氏夫人。麗文鋪所祀疹媽，稱潘氏夫人。元帥廟河墘所祀虎婆奶，稱江氏夫人，又稱虎婆坑，其香火由西河石山境分入。蓋江氏夫人乃城外虎坑人，俗人遂於座下塑一虎，祀夫人者亦以牲醴飼虎。俗云：“虎婆奶手上無罔給人抱。”豬母嶺祀藍田奶，隆普營烏山麓祀五代羅源徐公里女子月華、雪英。^①

境社廟中崇祀的“大王”，雖然地位不高，甚至可能無緣進入制度性宗教的神譜，但對其轄下的居民而言卻相當重要，居民每年都要組織各種祭祀活動：

大王在冥界裏地位不高，大約相當於陽世間的村長。境社香會常在正月或三月募集資金，請幾個道士來做法事，懇請大王和火神保佑本境平安，免遭瘟疫，一年中生意興隆。年終的時候，再舉行一次法事，酬謝大王一年中給予的種種保佑。境內各戶居民平日裏也總要到廟裏燒香上供。在鄉村，每年正月，村民們都要擡着大王在鄉裏四處巡遊，敲鑼打鼓非常喧鬧。在城區內的境社廟通常不做這樣的迎神遊行，而是在廟內組織各種崇拜活動。^②

境社舉辦此類活動，一般都有大型的宴會環節，只有“大王”“境”下的居民才有資格參加：

境社廟的神祇過生日的時候，境內居民集資慶賀，包括準備了大量的葷素菜肴。酒菜先在大王、娘奶等神靈座前上供，然後端上餐桌供幾十個、上百個客人食用。到了晚上，通常還請戲班來演戲。^③

元宵節期間境社斂錢聚飲，被稱爲“悅神”，酬神畢“即集飲祠中”，常常“歡呼達旦”。清人徐祚永有詩爲證：

皓月當空絕點塵，滿街燈火一番新。
太平景象真堪記，里社歡呼競賽神。^④

① 郭柏蒼：《竹間十日話》卷六，頁104。

② 盧公明：《中國人的社會生活》，頁366。

③ 同上。

④ 戴成芬輯：《榕城歲時記》（抄本，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不分卷，“悅神”條，無頁碼。